

中國典籍與文化 增刊

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

2014

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
ESSAYS COLLECTION

第 16 輯

鳳凰出版社

中國典籍與文化 增刊

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

2014

第 16 輯

 鳳凰出版社



論中國書籍雕版印刷技術產生的社會原因及其時間

- 辛德勇(4)
- 南北朝“抄撰學士”考 蔡丹君(177)
- 《元稹集編年箋注》錯誤舉隅 吳偉斌(199)
- 於無疑處見有疑
- 《范仲淹集》校勘札記 王瑞來(211)
- 《全芳備祖》異文考論
- 以日本官內廳書陵部藏宋刻殘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
比較為中心 趙 昱(240)
- 《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研究 江慶柏(259)
- 《全唐文》、《唐文拾遺》、《唐文續拾》重出誤收考 夏 婧(277)
- 竹垞老人晚年手牘考釋 張宗友(298)
- 新見朱彝尊致宋荦書札及相關問題考釋 龍 野(314)

主 辦 者: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編 輯 者:《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

地 址:北京大學校內哲學樓 328 號

通 訊:北京大學中文系轉

(郵政編碼 100871 電話 62751189 傳真 62751190)

E-mail:ccc@pku.edu.cn

出 版 者:鳳凰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政編碼 210009)

集團地址: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南京市湖南路 1 號 郵政編碼 210009)

集團網址: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論中國書籍雕版印刷技術產生的社會原因及其時間

- 辛德勇(4)
- 南北朝“抄撰學士”考 蔡丹君(177)
- 《元稹集編年箋注》錯誤舉隅 吳偉斌(199)
- 於無疑處見有疑
- 《范仲淹集》校勘札記 王瑞來(211)
- 《全芳備祖》異文考論
- 以日本官內廳書陵部藏宋刻殘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
比較為中心 趙 昱(240)
- 《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研究 江慶柏(259)
- 《全唐文》、《唐文拾遺》、《唐文續拾》重出誤收考 夏 婧(277)
- 竹垞老人晚年手牘考釋 張宗友(298)
- 新見朱彝尊致宋荦書札及相關問題考釋 龍 野(314)

主 辦 者: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編 輯 者:《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

地 址:北京大學校內哲學樓 328 號

通 訊:北京大學中文系轉

(郵政編碼 100871 電話 62751189 傳真 62751190)

E-mail:ccc@pku.edu.cn

出 版 者:鳳凰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政編碼 210009)

集團地址: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南京市湖南路 1 號 郵政編碼 210009)

集團網址: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蟬叟題襟日記·····	[清]何紹基撰 毛健輯錄(329)
李慈銘致友朋手札九通·····	張桂麗輯考(338)
葉承慶題跋五則·····	曹鑫輯考(348)
古籍經部影印本四種指瑕·····	朱天助(353)

【國家圖書館藏未刊稿整理研究】

藝風堂同人尺牘·····	謝冬榮整理(361)
非昔居士日記·····	[清]趙宗建撰 肖剛整理(381)
庚子非昔日記·····	[清]趙宗建撰 肖剛整理(422)
舊山樓日記·····	[清]趙宗建撰 肖剛整理(440)
英文目錄·····	(449)

照 排: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江蘇鳳凰通達印刷有限公司
 國內發行:江蘇省郵政局
 增刊刊號:(2008)京新出版報刊增准字第(520)號
 郵發代號:28—210
 國外發行: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國際標準刊號:ISSN1004—3241
 國外代號:Q1207
 出版時間:2014 年 11 月
 責任編輯:王 劍
 定 價:96.00 圓

1625650

中國典籍與文化 增刊

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

2014

第 16 輯

鳳凰出版社



論中國書籍雕版印刷技術產生的社會原因及其時間

- 辛德勇(4)
- 南北朝“抄撰學士”考 蔡丹君(177)
- 《元稹集編年箋注》錯誤舉隅 吳偉斌(199)
- 於無疑處見有疑
- 《范仲淹集》校勘札記 王瑞來(211)
- 《全芳備祖》異文考論
- 以日本官內廳書陵部藏宋刻殘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
比較為中心 趙 昱(240)
- 《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研究 江慶柏(259)
- 《全唐文》、《唐文拾遺》、《唐文續拾》重出誤收考 夏 婧(277)
- 竹垞老人晚年手牘考釋 張宗友(298)
- 新見朱彝尊致宋荦書札及相關問題考釋 龍 野(314)

主 辦 者: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編 輯 者:《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

地 址:北京大學校內哲學樓 328 號

通 訊:北京大學中文系轉

(郵政編碼 100871 電話 62751189 傳真 62751190)

E-mail:ccc@pku.edu.cn

出 版 者:鳳凰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政編碼 210009)

集團地址: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南京市湖南路 1 號 郵政編碼 210009)

集團網址: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蟻叟題襟日記	[清]何紹基 撰 毛 健 輯錄(329)
李慈銘致友朋手札九通	張桂麗 輯考(338)
葉承慶題跋五則	曹 鑫 輯考(348)
古籍經部影印本四種指瑕	朱天助(353)

【國家圖書館藏未刊稿整理研究】

藝風堂同人尺牘	謝冬榮 整理(361)
非昔居士日記	[清]趙宗建 撰 肖 剛 整理(381)
庚子非昔日記	[清]趙宗建 撰 肖 剛 整理(422)
舊山樓日記	[清]趙宗建 撰 肖 剛 整理(440)
英文目錄	(449)

照 排: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江蘇鳳凰通達印刷有限公司

國內發行:江蘇省郵政局

增刊刊號:(2008)京新出版報刊增准字第(520)號

郵發代號:28—210

國外發行: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國際標準刊號:ISSN1004—3241

國外代號:Q1207

出版時間:2014 年 11 月

責任編輯:王 劍

定 價:96.00 圓

論中國書籍雕版印刷技術產生的社會原因及其時間*

辛德勇

【提要】關於中國書籍雕版印刷技術產生的社會原因及其時間，現代學者中較早探索這一問題的人，如藤田豐八、向達和禿氏祐祥諸人，本來已經找到了正確的解析路徑，並且已經闡明其基本發展脈絡。然而，後來的論述，不僅未能循其軌轍，更進一步，反而去其真相漸行漸遠。本文一一辨析現有各種說法，試圖說明，印刷術在中國產生的時間，不得早於唐玄宗開元年間，而導致這一技術產生的文化和技術背景，是密教的全面興盛和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佛像捺印技術。

【關鍵詞】印刷術 雕版印刷 捺印 陀羅尼

書籍印刷術是中國古代貢獻於世界的“四大發明”之一，國人對此，無不津津樂道。然而，迄今為止，絕大多數中國學者對中國書籍雕版印刷技術產生的社會原因及其時間，却還沒有能夠做出比較具體並且合乎情理的說明，而且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同樣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從總體上看，當前域外學者所做論述，情況大體相似，認識也不够明晰。

事實上，現代學者中較早探索這一問題的人，如藤田豐八、向達、禿氏祐祥諸人，本來已經找到了正確的解析路徑，並且已經闡明其基本發展脈絡，只是後之學人未能循其軌轍，更進一步，以致治絲益棼，反而去其真相漸行漸遠。

有鑒於此，特撰述此文，嘗試予以論證，以求返本歸真，揭示歷史原貌。

一、傳世文獻有關早期雕版印刷的確切記載

前人論述印刷術起源問題，首先更為關注它的產生時間。印刷術具體出現在什麼時候，雖然還有待進一步論證，但至五代後唐馮道在洛陽刊印經書以後，始在北宋時期全面普及於中國，即如宋人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所云“版印

*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 10JJD770012“中國印刷術的發明與活字印刷發展綜合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以後典籍皆爲版本”^①。對於這一點，應該沒有多大分歧，至少沒有什麼人能够舉述出與此相反的證據。然而，自宋代起方始廣泛應用的雕版印刷術，其最初發明的時間究竟能够向前追溯到什麼年代，學者們的看法，却有很大差異，而這種差異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同許多人未能很好地理解沈括上述記載有關。

在分析《夢溪筆談》這段記述的時候，特別需要注意沈括是北宋神宗時人，他很容易看到大量製作於唐代和唐代以前的書籍。因此，沈氏所說“版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並不只是出自對相關歷史記載的推理判斷，更應該是他通過手摩目驗對比當時所流通唐宋間典籍之後寫下的實況記錄。蓋唐代雖然已經有印本行世，但範圍和數量還相當有限，宋人所見李唐一朝及其以前的書籍，基本上還都是手書的寫本。

較沈括行年稍晚之兩宋間人邵博，即因在早期印刷書籍當中，只是在其“曾大父遺書”裏面見到有馮道“長興年刻本”，乃徑謂之曰“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寫本”^②。基於同樣原因，約略與邵博同時人朱翌，亦謂“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③；同時人葉夢得也有相同的說法^④，而宋代更有代表性的著述，則是王應麟《玉海》引述的《國史藝文志》，使用與朱翌一模一樣的詞句，稱“唐末益州始有墨板”^⑤，這樣的說法，應是基於大量官方藏書的實際製作形式，具有更强的說服力。身歷靖康離亂的趙明誠、李清照夫婦，以富有藏書且多珍本秘籍而著稱於世，李清照《金石錄後序》一文中記述說，當建炎南渡之際，“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所謂“書之重大印本者”與夫“書之監本者”，顯然也只能是本朝當時的印本，故李清照下文記述其留存行篋未忍丟棄的唐人著述，若李、杜、韓、柳諸名家的集子，都只是寫本，絕然沒有提及唐代的刻本^⑥。再往後，宋元間人羅璧對此也有清楚敘述說：“唐末書猶未有模印，多是傳寫，故古人書不多而精審，作冊亦不解綫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概粘之〔猶今佛老經〕，其後稍作冊子。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始令國子監田敏校六經板行之，世方知鑄甚便。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鑄，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後方盡馳

①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八，文物出版社，1975年，蝴蝶裝影印元大德九年陳仁子東山書院刻本，第15a頁。

②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五，中華書局，1983年，第36頁。

③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下，中華書局，1999年，重印民國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原刻初印《知不足齋叢書》本，第682頁。

④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中華書局，1984年，第116頁。

⑤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商務印書館，1935年，《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江安傅氏雙鑒樓藏元刊本，第20a頁。

⑥ [宋]趙明誠《金石錄》卷末之李清照《金石錄後序》，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年，第561—563頁。

此禁。然則，士生於後者，何其幸也。”^①羅氏在這裏不僅談到書籍文字內容的製作方式是“模印”（亦即雕版印刷）抑或“傳寫”（亦即手書），而且還談到書籍裝幀形式在唐宋之間與此相伴隨所發生的明顯變化，自然應當是出自實際觀察。敦煌石窟中遺存的唐人實用典籍，絕大多數都是手寫成篇而罕見雕版印本，就是對上述記載最好的證明。

由印刷術全面普及的北宋時期向上追溯到“版印書籍……尚未盛爲之”的唐代，讓我們再來看看，唐代使用雕版技術來印刷書籍的直接記載究竟出現於何時。關於這一問題，過去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說法。其中很多觀點，還將唐代使用雕版技術的紀事完全等同於中國應用雕版印刷技術的最早記載，需要在下面各節逐一分析。這裏首先來確認一下得到絕大多數學者認可的可靠記載，最早是出現於什麼時候。

唐穆宗長慶四年（公元 825 年），元稹爲好友白居易的《白氏長慶集》撰寫序文，曾經提到“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②。至遲從明朝末年人胡震亨開始，就將此“模勒”元、白兩人詩作一事，視作唐朝已盛行雕版印刷的例證。這一說法，在清代乾隆年間，得到四庫館臣和趙翼的認同。晚近以來的學者，則從日人島田翰，到葉德輝、王國維，亦均承襲此說，謂元稹所說“模勒”，“自非鏤板不可”^③。基於葉、王兩氏在中國版刻史研究領域的奠基者地位，後來中國學者論及這一問題，遂遞相遵用其說，罕有異辭。

不過，也有一部分中外學者，如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與中國學者向達等人，並不認同這種說法。只是由於這些學者沒有深入展開論證，同時，利用外國學者的著述，在一定程度上還有語言文字的障礙，大多數中國學者對此未能予以充分關注。針對這兩種不同觀點，我曾撰寫文章，具體加以辨析，指出元稹所說“模勒”的本義，實際上等同於“模寫”或者“摹寫”，本來與雕版印刷毫無關係^④。

需要說明的是，伴隨着近年刻意尋求“新材料”學風的日益熾盛，不斷有人偏倚孤本秘籍以事“發現”。在這當中，有一名陳翀者，對日本鎌倉末期（大致相當於中國元朝中期）輾轉寫錄的一份“天下孤本”書目《二中歷》（此書內容是從《掌中歷》和《懷中歷》兩部書籍中摘錄出來的，其中《懷中歷》的著作年代已經晚至北宋末期的宣和四年）給予了特別的關注，看到這份列在所謂“經史歷”（出自《掌中歷》）名目之下開列的一份書目——“書史卷數”，在一百零三部基本經史子集各類典籍名目之下標注有“已上唐摺本注之”識語，而日本復多以

① [宋]羅璧《識遺》卷一“成書得書難”條，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4b。

② [唐]元稹《元稹集》卷五一，中華書局，1982 年，第 554—555 頁。

③ 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卷首王氏自序，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 年，影印《王國維遺書》本，第 353 頁。

④ 別詳拙文《唐人模勒元白詩非雕版印刷說——兼論中國早期書籍雕版印刷技術在世俗社會的傳播擴散過程》，刊《歷史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36—54 頁。

“摺本”表示刻本，陳氏便把這些書籍統統理解為“唐末五代刻本”，宣稱這一書目“極有可能就是一份保留在平安中後期大學寮的‘唐摺本’——唐末五代刻本書目。……極有可能是一把為重新評價五代出版事業，甚至五代的文化政策的一把重要的鑰匙（德勇案：此句不通，“鑰匙”多了“一把”，有明顯語病，但檢覈其原刊之處與編入文集者都是如此，似非手民誤植所致），希望今後能發現更多的新史料來對這個問題進行更深一層次的議論”^①。

檢視《二中歷》原書可知^②，在這些所謂“唐摺本”書籍當中，首列除了《孟子》以外的儒家《十二經》和《老子》、《莊子》^③，繼之便是包括迄至《隋書》為止的所有紀傳體“正史”，還有《說文》、《經典釋文》等文字訓詁書籍，包括《老子》、《莊子》（與上述附列於經書之後者重出）、《孟子》、《白虎通》、《鹽鐵論》、《顏氏家訓》、《吳越春秋》在內的先秦漢魏南北朝以至唐代的諸子雜史等，以及《初學記》、《六帖》等類書，唐代以前的重要典籍，幾乎應有盡有。更為不可思議的是，在這當中甚至還包括篇幅多達一千卷之巨的《文館詞林》。假若事實果真如此，這就不僅僅是五代出版事業和五代文化史的問題了，整個中國書籍史乃至文化史恐怕都需要重新評估，可以說是驚天動地的重大發現。但正如陳翀所指出的那樣，專門研究過這一文獻的日本著名文獻學家川瀨一馬，却完全沒有這樣看待這份書目，其中的原因不難揣摩，這就是如此規模浩大的出版印刷，違背其他可信史料所記載的基本史實，特別是北宋初期官刻經史典籍，絕未有人提到過這批刻本。歷史的發展，是有正常倫次的。文獻記載若是嚴重背戾這樣的倫次，就要反過來審視這一文獻本身是否存在問題，或者是我們的解讀出現了差誤。

如上述引文所見，陳翀在闡述這份書目在中國出版史上的價值時，竟有意回避唐朝的問題而只說“五代”了，這顯示出他也感覺到自己的解讀與其他相關記載存在很嚴重的抵牾，所以纔儘量使其延後一些，淡化唐朝，凸顯五代。殊不知即使如此，仍然存在無法彌縫的罅漏。

譬如，這份書目中載錄有“《後漢書》百廿卷”，這應該是以唐李賢等注范曄

① 陳翀《試探〈經史曆〉所見唐末五代大規模刻書之可能性》，原題《三善康為撰〈經史曆〉之文獻價值叙略——兼論唐末五代大規模刻書之可能性》，刊《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六輯（2010年），此據靜永健、陳翀合著文集《漢籍東漸及日藏古文獻論考稿》，中華書局，2011年，第43—72頁。

② 據日本育德財團在1937年按照原本裝幀形式影印復製的《尊經閣叢刊》本《二中歷》。此本一如原本，無頁碼標記。

③ 案以《老子》、《莊子》與儒家《十二經》並列，是承自西晉以來迄至北宋時期以前的慣例，蓋如四庫館臣在評議《經典釋文》一書時所云：“其列《老》、《莊》於經典而不取《孟子》，頗不可解，蓋北宋以前，《孟子》不列於經，而《老》、《莊》則自西晉以來為士大夫所推尚，（陸）德明生於陳季，猶沿六代之餘波也。”說見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三三《經部·五經總義》，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清浙江刻本，頁270。又李唐宗室尊崇老子與道家，《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卷九《玄宗紀》（頁213）載：“（開元）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並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經例考試。”《老》、《莊》既已列入明經之科，與儒家經典並尊，自然會更受重視。又案《二中歷》所開列書籍的稱謂，卷次等顯得比較雜亂，反映出前後不同時代的特徵。例如，在此“書史卷數”項下，《老子》和《莊子》即前後重出，除了上述與《十二經》並列者之外，又被編排在各種子書之首。

《後漢書》之九十卷紀傳與蕭梁劉昭注補之司馬彪《續漢書》三十卷志書合編而成的卷數(案李賢等注本《後漢書》原編一百卷,見於《舊唐書·經籍志》著錄^①。《二中歷》中,在陳翬所說的那份“唐摺本注之”書目之外,還具體開列有一些重要經子史書的篇目和卷次構成,其中載有“《後漢書》一百卷,范曄撰,皇太子臣賢注”,即屬此書。需要說明的是,《二中歷》具體開列的李賢注《後漢書》篇目,也間雜有“志三十卷”,但加入這一部分後“合百三十卷”,不僅與《舊唐書·經籍志》著錄的李賢注本卷數相抵牾,而且還與後來正式合刻司馬氏志於范曄書的一百二十卷本不符,應該是抄錄者徑隨己意添上了司馬彪《續漢書》志的部分,而此一百卷李賢注本乃合“十二帝后”之“帝紀十二卷”與“八十列傳八十八卷”^②。《二中歷》中置于“唐摺本注之”之列的合編一百二十卷本,將李賢所注編作九十卷者,是恢復范曄《後漢書》紀傳部分原來的卷數),而歷史文獻清楚記載,宋初太宗淳化五年和真宗景德二年兩次雕印李賢等注《後漢書》的時候,都還沒有加入司馬彪《續漢志》的內容,直至宋真宗乾興元年,國子監又一次重刊此書,始應從孫奭的請求,截取劉昭注本《後漢書》諸志補入李賢等人所注《後漢書》當中,將其一併刊行於世,從此纔出現這種一百二十卷本《後漢書》^③。因此,這份書目中所著錄的《後漢書》,假如確屬刻本,只能梓行於宋真宗乾興元年以後,而絕不會是什麼“唐末五代刻本”^④。

基於這一情況,再考慮到這份目錄實際書寫的時間已經很晚,可知所謂“唐摺本”云云,絕不可能是用來標記書目所載典籍的製作形式。或許有人以為,就像今天日本書商習稱中國刻本為“唐本”一樣,“唐摺本”不過是表示“中國刻本”的意思而已。不過,即使是這樣,仍然存在問題,在這份書目當中,有一些書,不管是在哪個朝代,都不大可能有刻本問世。例如《太祖實錄》二十卷,《太宗實錄》四十卷,這應該就是許敬宗等人奉敕編著的唐武德、貞觀兩朝

①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中華書局,1975年,第1989頁。

② 案在《二中歷》之《經史歷》中具體開列的《後漢書》篇目和卷次構成之末,附記云:“摺十二帝后,三十志,八十列傳八十卷,合百三十卷,本百二十二卷。”如上所述,“合百三十卷”,是抄錄者附入司馬彪《續漢書》諸志後的卷數,而“本百二十二卷”的“本”應該是指別本《後漢書》。《隋書·經籍志》著錄有“《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曄本,梁劉昭注”,其中已經補入三十卷司馬氏志。疑此“百二十二卷”本《後漢書》,便是這種劉昭注本,而傳抄間譌“百二十五卷”為“百二十二卷”。

③ 見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紹興刻本《後漢書》所附宋朝官牒,商務印書館,1958年,縮印洋裝本,第1353頁。又[宋]洪邁《容齋隨筆》之《四筆》卷一“范曄漢志”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26頁。案劉昭是在注釋范曄《後漢書》時,割取司馬彪《續漢書》裏的八志共三十卷,補在范曄《後漢書》之後,稱作“後漢書志”,並“注以補之”(《後漢書》卷末附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中華書局,1965年,第2頁)。《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中華書局,1973年,第954頁)著錄有“《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曄本,梁劉昭注”,便是這種劉昭“注補”本。

④ 案雖然唐代就已經有個別人取劉昭注補《續漢書》諸志與李賢注范曄書之本紀列傳合寫為一編,見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之《正史家》著錄(廣文書局,1981年,據《古逸叢書》影印本,第29頁),但當時編錄的卷次為“百卅卷”,這應當是簡單地把劉昭注補之三十卷《續漢書》諸志,抄附在李賢注范曄書一百卷原本的後面,與宋人合刻之一百二十卷本《後漢書》尚有明顯差別。

的實錄^①，但迄至清朝滅亡，歷代歷朝都沒有雕版印刷實錄的做法，即清初人潘耒所說“列朝實錄，秘藏天府，士大夫罕得見”者也^②。事實上，就連遠比實錄重要得多的“國史”，也從未在本朝雕印（李唐亦自有官修的國史）。唐朝的雕版印刷終不及宋元明清發達，何以竟會雕印實錄？由此可見，若簡單認作“中國刻本”解之，其中亦難免有更為混亂的誤記或誤解成分。又或許有人以為“已上唐摺本注之”諸字，是後人誤添，並非這份書目原有的標識，但把這樣一大批書籍統統誤記為“唐摺本”，同樣有些匪夷所思，應該還有更特別的原因。對此，同事喬秀岩教授教示云：“唐摺本”確應解作“中國刻本”，這可能是“後來有人看這份古老的目錄，看看當時有什麼書，其中有哪些是後來有刻本，看到有刻本的，就在那條目上標圈，‘以上唐摺本注之’就是對這標圈的說明。”循此思路，似乎可以推測，《二中歷》中“已上唐摺本注之”這條注記，當亦承自《掌中歷》，在《掌中歷》原書中，很可能對已有“唐摺本”者畫有諸如圓圈之類的標記，而我們今天見到的《二中歷》抄本，已經失去了這些符號。故喬氏所說，應該是目前所能想到的最合乎情理的解釋。

不管實際情況究竟如何，都可以斷言，此一書目之上附注的“唐摺本”云云字樣，必定是由於某種原因而陰差陽錯地造成的低級錯謬，初不必詫為揭示雕版印刷史新奇面目的珍稀史料。

這樣一來，世所公認最早記錄雕版印刷行用情況的歷史文獻資料，就應該是《冊府元龜》當中如下一段記載：

〔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東川節度使馮宿奏，准敕，禁斷印曆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③

李唐朝廷禁斷版印“曆日”亦即後世所說“曆書”的敕文，尚別見於《舊唐書》本紀，書作“敕諸道府不得私置曆日版”^④。這項禁令所針對的範圍，遠不止一地，而依據《冊府元龜》的記載，則主要是指劍南地區的東川節度使（治梓州，今三台）、西川節度使（治成都府，今成都）以及江淮之間的淮南節度使（治揚州，今揚州）所轄區域。地域跨度如此之大，顯示出應確如宿白所云，“玩味‘每歲司天臺未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句，則印賣曆日之始，似又在太和九年之前”^⑤。據研究，俄藏敦煌文獻中的 Дх02880 號文書，即為雕版印製的唐大和

①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中華書局，1977年，第5088頁。

② [清]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六《國史考異序》，清康熙刻本，第6a頁。

③ [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一六〇《帝王部·革弊》，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明崇禎刻本，第1932頁。

④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第563頁。

⑤ 宿白《唐五代時期雕版印刷手工業的發展》，原刊《文物》1981年第5期，此據作者文集《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頁。

八年甲寅歲具注曆日的殘片^①，曆日的年份正好是在太和九年的前一年，而按照慣例，每年的曆日都要在上一年提前印製，亦即這件曆日應當印製於太和七年癸丑歲。這一印刷品實物適可與《冊府元龜》的記載相互印證。問題是由此再向前追溯，究竟應該追溯到什麼時候纔算比較適宜？

二、印刷術起源於唐代以前諸說辨析

按照一般的情理來推測，若是追溯到唐朝以前，時間明顯過早，不够合理。然而，很久以來，直到現在，仍有很多人主張印刷術產生於唐代以前，甚至可以說當前中國國內的大多數學者，都有這樣的看法。因此，討論這一問題，首先需要對印刷術起源於唐以前諸說，稍加剖析。印刷術起源於唐代以前的說法，最早者謂始自西漢，歷東漢魏晉南北朝以迄於隋，紛紜錯雜，前人雖然都曾有所辨說，而且其中一些說法如今已經沒有多大影響，但爲了正本清源，還需要一一予以清理；況且其中頗有一些問題，前人所論，尚且未能切中肯綮，從而也就更有必要做出進一步的考辨。

（一）西漢說

明確主張印刷術產生於西漢時期，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纔出現的新說法，持此說者，主要有版本學者楊繩信和考古學者印志華。由於證據過於飄渺，實際上連倡言者本人也沒有多少自信。故如楊繩信文章的題目，乃書作“雕板印刷也許起源於西漢”；印志華在提出這一觀點時，也是猶猶豫豫地說“雕版印刷術可能起源於西漢晚期”，都是很不確定的推測語氣^②。

楊繩信做此推論的史料依據，主要有兩條。一是西漢後期人揚雄在與劉歆的通信中述及所著《方言》時講過的一句話，謂時人張竦（字伯松）稱贊《方言》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③。楊氏以爲“‘不刊之書’四字連用一起，意思是很明顯的，不刊刻的書也就是不刊印的書”，從而推斷說：“此時已有雕版印刷了。”二是東漢人應劭在《風俗通義》中談到“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④，楊氏以爲這裏所說“刊定”指的也

① 蘇雅《我國發現的現存最早雕版印刷品——〈唐大和八年甲寅歲（834）具注曆日〉》，刊《中國文物報》2000年2月2日第3版。

② 楊繩信《雕板印刷也許起源於西漢》，刊《光明日報》1993年11月21日第6版《考古與文物》專欄。印志華的觀點見2005年8月18日《揚州晚報》所刊記者桂國撰新聞稿件《雕版印刷術可能起源於西漢》。

③ 案語見唐宋間失名集錄《古文苑》卷一〇揚雄《答劉歆書》，商務印書館，民國《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常熟瞿氏藏宋刊本，第77頁。

④ 案語見[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六〇六《文部·簡》，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宋本，第2725頁。

是“刊印”，亦即雕版印刷^①。楊繩信在這裏將“不刊”和“刊定”的“刊”字都理解為刻印書籍，實在有些過於離奇。不過，據明正德嘉靖間人楊慎講，當時似乎就有過類似的解讀^②，也可以說是淵源有自，因而或許也還算不上是什麼“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實際上揚雄所說“不刊之書”，正與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文中“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這句話的用法相同，其意乃謂“是不可刊削之書也”^③，亦即文義至精至善而不能做任何更改。明朝學者楊慎即特地辨析過這一問題，以為所謂“不刊之書”乃“言不可削除也”，明人將此“刊”字移作“刻梓之用”，並不符合文字本義^④。蓋漢晉間人著述多是書之於竹木簡冊，改易字句需先以“書刀”刮削掉原文，故這裏的“刊”字意即“削也”^⑤，本來是非常通行的語義，應劭謂劉向在漢成帝時為朝廷校定典籍，先書之於竹，經“改易刊定”之後，始書寫於“素”，同樣也是先在竹簡上“刊削”謄誤的文字，改正後再在絹帛之類的絲織品上寫錄定本。由於楊繩信的解讀，與文獻記載的本義出入太大，其文章發表不久，就有人撰寫反駁文章，澄清史實^⑥。

印志華的說法，更沒有任何具體的依據，他只是覺得西漢晚期已經具備了雕版印刷術的技藝和所需要基本物質條件，亦即雕版技術、紙、黑墨、毛筆和規範文字等，因此“人們創造發明雕版印刷術是完全可能的。另一方面，西漢王朝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鼎盛的封建王朝，社會生活和生產的迅猛發展也為雕版印刷術的出現提供了客觀需求”。印氏以為“任何新技術的出現都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如果沒有兩漢、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的蟄伏傳承，我們就很難理解隋唐時期雕版印刷術的成就”^⑦。像這樣想當然的猜想，根本無需討論，事實上也無法討論。

（二）東漢說

與前述西漢說相比，印刷術起源於東漢時期的說法，堪稱源遠流長，論者多以為源自元朝人王幼學，其說係出自對朱熹《資治通鑑綱目》的解讀。《資治通鑑綱目》述東漢靈帝建寧二年十月，因“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上書告

① 楊繩信《雕版印刷也許起源於西漢》，刊《光明日報》1993年11月21日第6版《考古與文物》專欄。

② [明]楊慎《升庵外集》卷九一《字說》之“俗用刊字誤”條，臺灣學生書局，1971年，屈萬里主編《雜著秘笈叢刊》影印明萬曆間江寧顧起元刻本，第3395—3396頁。

③ [唐]孔穎達《春秋正義》卷首晉杜預《春秋序》並孔氏疏語，藝文印書館，2007年，影印清嘉慶二十一年南昌府學刊《十三經注疏》本，第11頁。

④ [明]楊慎《升庵外集》卷九一《字說》之“俗用刊字誤”條，第3395—3396頁。

⑤ [曹魏]張揖《廣雅·釋詁》，據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三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清嘉慶刻本，第83頁。

⑥ 陳新《荒唐的文義誤解》，刊《閱讀與寫作》2000年第8期，第20頁。劉川民《釋“刊”——兼與楊繩信先生商榷》，刊《古漢語研究》1995年第2期，第20—21頁。

⑦ 見《揚州晚報》2005年8月18日刊桂國撰《雕版印刷術可能起源於西漢》。

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党，圖危社稷”，故漢靈帝“詔刊章捕儉等”^①。元朝人王幼學在延祐泰定年間撰著《通鑒綱目集覽》，乃釋之曰：“刊章，印行之文，如今板榜。”^②這是將“刊章”二字理解爲刻版印製通緝人犯的文告。明益藩莊王朱厚燁，在嘉靖年間依據此事更明確指出：“刻印之法，漢已有之，……則刻書實始於漢人。”^③至清朝咸同年間，湖北江陵人鄭機又引申王幼學的看法，謂“印板不始於五代”，而在東漢靈帝下詔“刊章捕儉”時固已有之^④。民國時莫伯驥嘗“撰《經籍故》一書凡數十卷”，同樣以爲朱厚燁刻書始於漢人的說法“亦未嘗無據”^⑤。

沿承這一說法的人，在當代研治版刻史者中，應以李致忠最有代表性。這是因爲他對相關史料和問題，做了比較系統的闡釋，而後來秉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大多都是遵奉復述其說或者稍加推衍。

如同很多學者已經指出的那樣，在傳世文獻當中，對漢靈帝“詔刊章捕儉”一事的解釋，最早見於唐章懷太子李賢主持撰著的《後漢書》注。李賢等在《黨錮傳》序文記述“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党，圖危社稷”，故“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句下注云：“刊，削。不欲宣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⑥又《後漢書·孔融傳》述及同事，謂“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李賢等亦有注云：“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⑦兩相對比可知，王幼學等人所作詮釋，與之完全不同。

對古代文獻的解釋，後世學人之間出現分歧，是常有的事情。我們在閱讀各家觀點的時候，首先要從大處入手，知悉相關著述在性質和時代上的差異以及學者認識能力的高下。就章懷太子李賢的《後漢書注》和元人王幼學的《通鑒綱目集覽》而言，前者是專門對《後漢書》做訓詁疏釋，清人邵晉涵稱譽其“徵引之廣博、訓釋之簡當，爲史注之善者”^⑧；相比之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一書旨在仿效《春秋》的褒貶筆法，略舉史事大綱而昭示鑒戒，“以合於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後世權謀術數，利害苟且之失，一毫無得參焉”，從而實現“統正於

① [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朱子全書》本，第763頁。

② [清]聖祖玄燁《御批資治通鑒綱目》卷一二上元王幼學《集覽》，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9a頁。

③ [明]朱厚燁《勿齋集》卷一，據近人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卷二“明會通館活字銅板校正音釋春秋”條（中國書店出版社，2008年，《海王村古籍書目題跋叢刊》影印1936年東莞莫培元等鉛印本，第72頁）引述朱厚燁說。案朱氏《勿齋集》世鮮傳本，我沒有見到原書，故在此姑且依據莫氏書轉引。

④ [清]鄭機《師竹齋讀書隨筆彙編》卷一二《讀書叢記·雜考·人事》，清光緒壬寅七松堂刻本，頁22b。

⑤ 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卷二“明會通館活字銅板校正音釋春秋”條，第72頁；又卷末附莫氏從子培元、培遠跋文，第714頁。

⑥ 《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並唐李賢注，第2188頁。

⑦ 《後漢書》卷七〇《孔融傳》並唐李賢注，第2262頁。

⑧ [清]邵晉涵《南江書錄》之“後漢書”條，清光緒中貴池劉氏刻《聚學軒叢書》本，第12b頁。